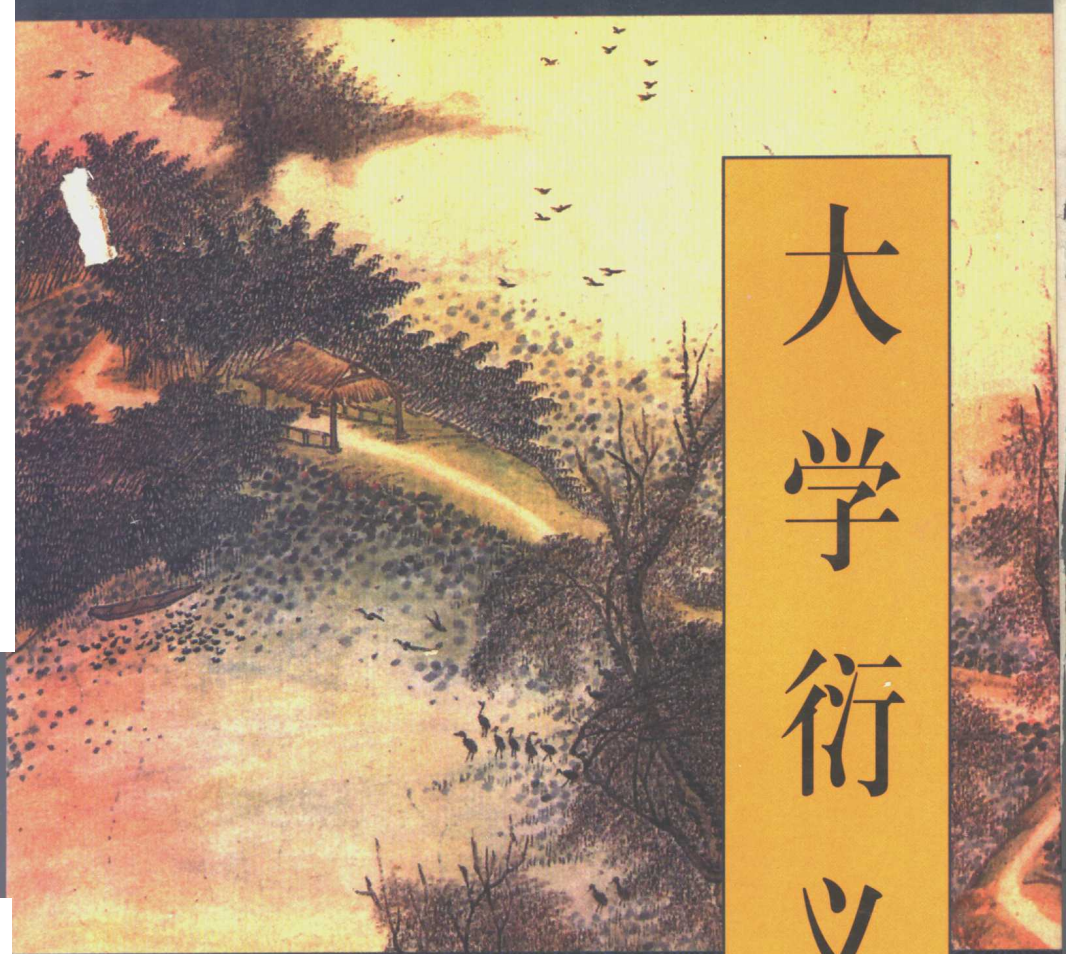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学衍义补

上

明·邱浚 著

林冠群 周济夫 校点

京华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孔 盈
封面设计:孙 岩



ISBN 7-80600-368-1



9 787806 003688 >

ISBN 7-80600-368-1

G · 202 定价: 89.00 元
(上中下册)

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

大学衍义补

明·邱浚 著

林冠群 周济夫 校点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学衍义补/明·邱浚著;林冠群 周济夫校点. —北京:
京华出版社,1999

(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)

ISBN 7-80600-368-1

I. 大… II. ①邱… ②林… III. 政书—明代 IV. D69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5717 号

大学衍义补

明·邱 浚 著

林冠群 周济夫 校点

责任编辑:孔 盈 责任校对:晶 华

技术编辑:凌 敏 封面设计:孙 岩

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011 北京市安外青年湖西里甲 1 号)

北京普瑞德印刷厂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45.875 印张 144 千字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定价:89.00 元

凡 例

一、本书校点，以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本（简称库本）作为底本，以日本宽正四年（1972）和刻本（简称宽本）与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海口市海南书局铅字本（简称局本）作为参校本。

二、对于三本中出现的异文和讹漏之处，一般择善而从，酌加改正。有疑问之处，尽量查检原出处，以定去取。

三、库本基于清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现实，对原书中涉及华夷之限、民族关系等处，多所删改，今皆依据宽本、局本，一一补正，以保持原貌。

四、对于书中的异体字，皆替以通行字；通假字，则保持原状；避讳字，则改回原字。

五、著者对于少数字汇，有固定的书写习惯，如“唯”写作“惟”、“阵”写作“陈”、“预”写作“豫”、“仇”写作“佳谁”等，因为出现太多，故未作改动。

六、在校勘中，凡有异文和更动之处，皆以校记加以说明。校记的序号，视其对象不同，而分别置于字、词、句之后。

七、采用新式标点，但不求过细，只求简易明达，便于读者即可。破折号、省略号之类，一般不使用。

八、书中凡属对话或进言之处，酌加引号。但因该书引文多不完整，且杂有著者意改之语，故引号中的文字间或与原文有所出入，读者若征引时，还须翻检原出处。

九、为了方便排版，并便于读者，采用简体字横排，不论是摘引经史、后儒论说还是作者按语，一律顶格排（首行低二字），不再加以区分。行款中称尊抬头之处，亦一律取消。行中夹注则加以保留，并以方括号标示。

邱浚和他的《大学衍义补》

(前 言)

古代的海南岛就像至高无上的皇帝置于海上的囚牢。违逆犯上，湮乱纪纲的臣子常被驱逐到这里服刑。如此凶蛮不吉的穷荒之地，人们自然不会把它和富庶休祥，人文鼎盛的文献之邦联系起来。可是，中土的文明就像涨溢的河流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总会润泽到遐荒绝域。到了十三世纪中叶，“淮南布衣”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，海南岛的气象便不同往昔了。在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年代，科举考试从这海外孤岛上选拔了数以百计的进士、举人。终明之世，从这批令内陆人瞠目的进士举人中，涌现了几十名享誉天下的干臣大吏。至此，琼岛的形象便由海外蛮荒变成了“滨海邹鲁之地”。琼人宦迹四方，名声鹊起了。

明代是海南岛创造辉煌的时代。

本书的作者邱浚(1420—1495)便是这批干臣大吏中地位最显赫的一位。这位出生于海南琼山(今海南省琼山市)的普通人家子弟，宦途上由翰林院庶吉士一直做到礼部尚书、户部尚书、内阁大学士(相当于宰相)。这样的机遇与地位，至今海南的历史上仍是绝无仅有。轻易地把这遗忘或不予重视，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。

考察封建官场，官要做到与宰相相当的内阁大学士一职，的确是件“惊天动地”的大事。开国皇帝是“天命有归”，嗣位皇帝是“圣由天纵”，都不是旁人随便可以觊觎的。所以，作为人臣，当上宰相也算是“富贵到顶”了。寻常人家子弟，能够如此荣显，令世人惊愕感叹之余，总要追索点发迹的根由：生有异禀，相貌不凡，祖上荫德……邱浚自然也不例外。据说他的祖父邱普是位小医官，“性仁爱，专事济人利物”，在社会上做了许多好事、善事。而且“其行自少至老多类此，年享遐寿”。这就是说，一辈子都做好事，所以该他有“天报”，孙子当上了大学士。以此劝善，用意自然不错，但光凭这一条，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太相信了。还是邱浚的天赋令人倾倒：“浚生有异质，读书过目成诵，日记千言。六岁能信口为诗歌，语皆警拔。如咏《五指山》诗，识者皆知其必为国器。”(《琼州府志》)诗言志，那出语不凡的《五指山》诗，的确道出了少

年邱浚的豪迈情怀。而且聪明还加勤奋,《明史》称他“家贫无书,尝走数百里借书,必得乃已。”有时遭藏书家白眼叱责,他也不怨。而且他无书不读,博极群书,天文历数,兵农医释,无所不及,甚至户口、盐铁、军马之类,也照样涉猎,留心研究。及至后来进入仕途之后,仍然苦读不辍,直至晚年,一目失明,还保留读书的习惯。对历朝典章制度,尤其精熟,为同时代的知识分子、学者闻人所称道。当他以自己丰富博洽的学识在人才荟萃的京华一展风采时,还着实令那些士大夫们大吃一惊:这来自天涯海角的穷书生,哪来这么深厚的学问根底?他们自然不太了解,邱浚即使为了读到一本书,也可以“转洊数十人,积久三五年而后得”地殷勤追求。

邱浚一生光辉的仕途,可以说是由他丰富的学识开创的。

然而,假如没有科举取士这一条,再丰富的学识,恐怕也不过像埋藏在深山幽谷里的珍宝,任你地老天荒,也无人见识。科举考试架起了天梯,不仅邱浚,与他同时代的那一批批被遮隔在千古涛声后面的琼岛秀士们,因此有了登天的机会。科举考试为明代海南岛的辉煌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。当然,要批评科举考试,可以列出许多罪状,但是它为天下士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,这一点又“功不可没”,未可一笔扫倒。假如只凭长官意志,凭个人好恶,“说你行,你就行,不行也行”,那么像邱浚这样的“荒陬孤生”,又如何有机会荣登相位,使天下人知道“人才不地出”,天涯海角也有相才?

而且就其实质而言,明代的科举制度选拔了邱浚、海瑞这样的琼籍人士,应该说是明代的一大光彩。因为这两人为官的清廉(其实不止这两人,明代出仕的琼籍人士,也基本如此),在明代贪浊的官场上,可以说皎如日月,耿光远射。“范进中举”的故事告诉我们,科举考试可以改变人的整个生命历程,可以让人产生由饿死到饱死的戏剧性变化。在邱浚那个时代,不要说中进士,就是中个举人,也就不再受穷了。“及登甲科,则钟鸣鼎食,肥马轻裘,膏腴遍野,大厦凌空。”(《复社纪略》)至于官能做到内阁大学士,一切荣华富贵,锦衣玉食,更是无复言喻。邱浚十七岁开始学习举业,第一次参加乡试,便名登榜首,其后被选送太学读书。景泰五年,复试于礼部,中廷试二甲第一名进士。从此进入仕途。

如此青云直上的仕进荣华,按当时的习尚,该可以致身富贵,改换门庭了,但远在天涯的邱浚一门,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。也许邱浚从儒家经典那里师承的是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的立身大节,而不是光耀门庭,衣锦荣归的个人物质追求,所以世俗的财利虚荣,对于他不过如草芥粪土,不值得贪恋追求。观察邱浚一生的作为,的确可以此立论。比如史志上说他“文章雄浑壮丽,四方求者沓至。碑铭序记词赋之作,流布远迹,然非其人,虽

以厚币请之，不与。”（《琼州府志》）虽有人肯出大价钱买文章，但对方若是他瞧不起的，德行有亏的人，许给万金，他也不写。光凭这点就可以看出他为人气节。连该拿的钱他都不拿，那些见不得光的“隐形收入”，他就更不沾手了。所以，与同时的官场僚友相比，他就一直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。直到后来当上了礼部尚书，当上了内阁大学士，依然如此生活。他在朝廷任职四十多年间，一直住在京城苏州巷南的一座小宅子里，“规模卑陋，聊蔽风雨，始终未尝少拓”。皇帝给的官俸，多余的他就用充官费，没有多少储存。所以他死的时候，除了数万卷图书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皇帝为此感叹不已。京城百姓把他住的那条巷称为“邱阁老巷”。他不仅自身俭约成性，对家属也能严格要求。他的儿子邱敦，按身份完全能够当个出门乘马张盖，锦绣罗身，奴仆成群的公子哥儿，但他节俭的美德似乎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不喜穿新衣服，出门安步当车，靠路边走。行人一望就知道是邱阁老的公子。

一个人的俭朴，可以说是为子孙计；一个官员，特别是高级官员的俭朴，那就是为天下国家计。一味贪图享受，为待遇和特权虎视别人，却又自诩为“万家忧乐到心头”的国老，那不过是江湖骗子品格。以此检验邱浚，可以得其评价的大半。

看来，邱浚对自己能当上宰相的高官，并无多少思想准备。自从他三十四岁（明景泰五年）开始进入仕途之后，二十多年间，他一直在翰林院任一般吏员。其间因两广用兵平乱事，邱浚提出了很切实际的建议，受英宗皇帝的嘉许，在官场上才开始引人注目。此后，直到六十岁，他才提升为礼部侍郎，掌管国子监，成了朝廷的高级官员之一。又过了十一年，邱浚已经七十一岁了，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进入内阁，成为内阁大学士，达到了明朝仕宦的顶峰。但他三次向皇帝提出辞职，认为自己年老体衰，不堪重任。以后又年年请求致仕归休，请让位于高贤。这样，他在相位上只干了四年，直到七十五岁去世。

列出邱浚上述仕宦时间表，再看看后人对他一生功业的认识，可以得出其评价的另一半。

何乔新为他写的《墓志铭》称他“晚登政府，疾病半之，故见于功业者仅若此。然《大学衍义补》一书，其经济之才可见矣；《朱子学的》一书，其为理学亦可知矣。经济、理学兼而有之，使得久于位，尽行其言，相业岂三君子（指唐张九龄、宋余靖、崔与之三人，皆岭南名臣）可及哉！”然而，清乾隆年间，主编《四库全书》的纪昀在他的《四库提要》中却认为邱浚“其人不足重”，“相业不足称”。对邱浚一生功业基本持否定态度。纪昀的看法，可以说是某种代表，明清以来，持相同观点的也不少。如何判断这两种不同的看法？最好还是全

面地研究史实。因为历史上一些涉及个人的论定，往往有“身后是非谁管得”的无奈。像邱浚这样，屹起于天涯海角，又“天性刚决，不肯依阿澳涩，与世沉浮”（《琼台诗话》）的人，无帮派声援，无徒众吹嘘，这在门户私见日盛，党派纷争渐起，“有中立亦视为仇”（《国史旧闻》）的明代中叶，要想得个实事求是的好名声是不容易的，但因偏见而受谤，却并非怪事。

考邱浚三十四岁进入仕途，其后二十多年时间，身居下僚，位卑言轻，要想政治上有大建树，自然不可能，尽管如此，有两件事仍足称道。一是奏请免调海南卫所的官兵到大陆参加防务，而专门负责海南的治安，使众多军士得以解除远离乡土的愁苦。二是向大学士李贤提出解决两广“平乱”难题的建议，切实可行，得到英宗皇帝的嘉赏。此后直到六十岁，才有机会升为礼部侍郎，掌管国子监工作。这期间，他努力改变明中叶的学风、文风，主持南京乡试、礼部会试时，大胆痛革那些专好“怪词险语”，学风、文风浮薄狂躁的恶习，并把这看作是一道德，淳风俗的政治措施。当时的江南狂生桑悦等曾因此而落第，当面诋毁他的文章为“逐秽之文”（《艺苑卮言》），但他并不因此而有所畏缩。他在太学的政绩，当时人的评价是“师道尊严，无愧李文忠公，综观细微，则文忠公不及。”（《琼州府志》）可见并非平庸无称，而是比前任干得更出色。七十一岁后，升任礼部尚书，转户部尚书，入阁为大学士，参与国家军政大事的决策，行宰相的职务。但邱浚自知年老体衰，恐妨贤路，不断提出辞职。如果他是那种蓄意谋官，恋栈不去的角色，恐怕他还要虚报岁数，多任几年，哪肯轻易放弃这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”的相国地位？但尽管邱浚再三辞职，孝宗皇帝还是不批，好言宣慰。

邱浚居相位仅四年，一目失明，衰病老迈，要想他“相业可称”，干出一番大事业，这未免近乎苛求。但他也并不因此而安享尊荣，悠游岁月。他积极向皇帝提建议，首先规劝皇帝“谨好尚而不流于异端邪见，谨用度而不至于耗国害民；谨任用而不失于偏听独任。”（《琼台会稿》）正身、节俭、善任，这是一个英主明君的必备条件，邱浚以此规劝皇帝，起码可以看出他为人的一点勇气和正气。不仅如此，邱浚还针对当时社会的弊端，提出治理国家的二十二条建议。如禁止兴建佛道寺观，炼丹修仙等迷信活动；禁止大肆宴赏赐予，追求珠玉玩物等奢侈浪费；禁止内监宫人等滥用皇室特权强买民间物品，与民争利；禁止皇亲国戚及功臣等侵占老百姓的田地；禁止专为皇帝织造“锦绣纱罗”，置办器皿物事，进奉珍奇宝物；禁止巧立名目增加官员职数，希求升赏等。孝宗皇帝对这些建议十分重视，亲自降旨：“这本所言止印经，节赏物，停织造，杜塞希求升赏等项，皆切中时弊。该衙门看了来说。钦此。”（《琼台会稿》）事实上，弘治初年，孝宗曾经实行的罢遣佛道主持人物，整顿吏治，停罢

织造,抑制兼并等,都是邱浚提出过的建议。而弘治初年,在明代历史上是史家公认的“中兴再造”之期,孝宗皇帝是明中叶最开明有为的一个皇帝。“召敢言之臣,求方正之士”,一时正直才俊之士多在朝列,这是史家对他用人的评价。这样的一位皇帝,对邱浚这样的“远方下士”能如此钟爱,还不足以说明邱浚其人的德才吗?而邱浚躬逢其时,居于首辅之列,“弘治中兴”的政绩,难道都没有他的功劳?显然,“相业不可称”实在是一种贬抑过甚之词,说明那些有意贬低他的人已经到了不顾事实的地步了。

不仅如此,当时还流传有一些不利于他人品的闲言碎语。如说他以一种“阁老饼”取宠于皇上而获得大学士的职位;说他与两广巡抚叶某意见不合,“每投间毁之”(《菽园杂记》),使叶某受谤不能升官;说他“性偏隘”(《明史》)常与人争论,甚至把帽子掷地下;说他阴助太医院判刘文泰攻击大学士王恕等。这些,大概就是纪昀所说的“其人不足重”的注脚吧。然而,与“相业不可称”的评价一样,这也显系一种过分的贬损之词。明中叶以后,士大夫之间,“不务举贤进能,又不平心静气,而专务于分门立户,各怀偏见”(《明史·邹元标传》),在这种情况下,有些事情即使出于简牍,也未可置信。如说邱浚献“阁老饼”求官,但据史籍所记,邱浚本人的胸怀志趣,言行气节并不像个热中于钻营取巧,邀宠干禄的人。他一生俭朴廉正,对物质生活绝无贪恋之意,这是正史都论定的。他也自言“人生但得平平过,不用标词更问天”,“平生做事不跷蹊”(《琼台诗话》),以他自己的才学,二十多年身居下僚,也安之若素,皇帝要他做内阁大学士,他再三提出辞职。这些举动能说他是个采取卑劣手法去谋取职位的人吗?如果是这种人,他会反对向皇帝进奉珍奇玩物吗?至于其他传闻,也都难于论定是非,或出于个人性格上的特点,不能就看作是“其人不足重”的依据。而为官清廉这一条,却是一切高风亮节中最可贵重的一点。纪昀的评价,实不公允。

《明名臣录》称:“邱文庄公颖悟绝伦,无书不读……国朝大臣严于律己,理学之博,著述之富,无有出其右者。”

邱浚一生的功业在于他的著述。

他的主要著作有:《世史正纲》、《家礼仪节》、《朱子学的》、《大学衍义补》等,还参与编撰或主编《寰宇通志》、《明英宗实录》、《宋元纲目》等历史典籍。另外,《邱文庄公集》和《琼台会稿》二书还收有他大量的诗词、散文。还有《五伦全备记》、《投笔记》、《举鼎记》等戏曲传世。

邱浚最重要最用心力的著作就是这部《大学衍义补》。他在《大学衍义补》及《进〈大学衍义补〉表》中表明,早在宪宗皇帝时,已有志于编纂此书,后因执掌太学的机会,“暇日因采六经诸史,百氏之阙也,缮写适完”,自谓“竭

平生之精力，始克成编”。而从本书的立意和篇幅上看，也的确是邱浚所有著作中规模最宏大，意义最深远的一部，寄托着邱浚“爱君忧国”的深切情怀。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年）孝宗刚即位三个月，邱浚即呈送此书，“上览之，甚喜。批答有曰：‘卿所纂书，考据精详，论述该博，有裨政治，朕甚嘉之。’赏金币，命所司刊行。”（《琼州府志》）这就是说，书编成后不久，即得到皇帝的赞可，赐给经费，刊刻印行。弘治元年（1488年），礼部遵皇帝命，将此书抄出副本，送福建建宁府书坊印行。据与邱浚同时的陆容在《菽园杂记》中所载“近时邱祭酒先生浚，进所著《大学衍义补》若干卷，朝廷命刻板印行。”于此可知，弘治初年，本书已有刻本传世。据调查，目前国内所藏的明代版本，除上述弘治元年建宁府刻本外，还有宗文堂刻本（年代不详，在善本书目中排在弘治本之后）、嘉靖三十八年吉澄、樊献科等刻本、万历三十三年神宗皇帝作序的内府刻本、同年乔应甲等人的刻本、明末崇祯时刻本等。另据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志》载，明代还有张溥刻本，不知今尚存否。清代现存的本子，则有顺治十三年张熊麟删刻本、乾隆年间《四库全书》本、同治十三年刻本等。时至现代，海口市海南书局在王国宪主持下，曾于1931年将此书用铅字排印出版。在日本，则有宽正四年（1792）的和刻本。版本之众多，刊刻之频繁，正好说明《大学衍义补》其书之重要、影响之广泛。

由于条件的限制，上面所举的一些版本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。我们现在校点所用的底本是四库影印本，全书一百六十卷，另有卷首一卷，神宗皇帝御制序一篇，邱浚原序一篇，邱浚《进〈大学衍义补〉表》一篇，书前还有纪昀写的《提要》，但无目录和陈仁锡序。用以参校的本子是影日本宽正四年（1792年）和刻本与1931年海南书局铅字本。宽正四年本也是正文一百六十卷，卷首一卷，除有神宗皇帝序、邱浚原序、邱浚表文外，还有陈仁锡序、日本人平安福井辄为此本所作序、弘治时礼部尚书周洪谟为撰写《大学衍义补》一书的题本等，书前还有详细的目录。以上两种本子，都有神宗皇帝序及万历时人陈仁锡序，估计是据万历三十三年内府本（由陈仁锡评阅）重刻。海南书局本，因为找到的本子前面一册已佚，因而无法知道它的版本源流情况。三种本子比较，可说各有短长，错讹也多少不一，但除四库本因民族歧见，有意删去许多涉及民族关系的段落句子外，都可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本子。

《大学衍义补》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？这首先要见识一下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《大学》。据朱熹《大学章句序》，“《大学》之书，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。”所谓古之大学，按朱熹的说法，指的是唐虞夏商周，二帝三王时代的“大学”。那时的人，八岁入小学，学洒扫应对，进退之节，学礼乐射御书数之文，

也就是技术应用方面的知识。到十五岁以后，入大学，这时候学理论，学修己治人之道。这种学习要求学生“知其性分之所固有，职分之所当为，而又各俯焉以尽其力”。据说这是曾经存在过的理想社会中进步的教育方法。后世正统的儒家学者都对此推崇备至。但是东周以后，这种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逐渐失传。今天所见到的《大学》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根据孔子的传授记录整理保存下来的。但“其书虽存，而知者鲜矣”，并未引起社会的重视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教育主要表现为学者收授学徒的形式，而学者用以教育学生的，却是各自的学说，形成了“诸子百家”的局面。汉唐以后，虽有董仲舒“独尊儒术”之举，儒家学说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教材，但《大学》仍未单独列为一种教材进入社会教育规程之中，而是作为《礼记》的一章传世，自然知者不多。至宋代，理学家程颢、程颐经过一番考究，将《大学》从《礼记》中剔出，认为这是二帝三王时期，高等教育的教材。从此“古者大学教人之法，圣经贤传之指，粲然复明于世”。（《大学章句序》）其后，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又对此书作了一番更为精审的考释补辑工作，写成《大学章句》和《大学或问》二书。封建王朝也将其与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并举，作为科举考试必读的“四书”。

《大学》一书究竟有什么“微言大义”，值得如此重视？据曾参传述孔子的话，共有二百五十言，还不及《道德经》多。主要意思是说：大学所要弄通的道理在于，治国治民，治人治己，首先要求自己发挥本身善良的天性，养成极高的道德水准，然后以此去教育别人，影响别人，使整个社会能达到真善美的极高境界。为达到这种境界，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其知，在格物。”这一顺序推演的结果只是一句话：从我做起。而“我”必须是一个学养俱佳，事理通达的明白人。反过来，这样的明白人“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这也就是所谓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出处。

既是关乎天下国家的大事，其意义自然非同小可。邱浚自己评价《大学》一书为：“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。原于一人之心，该夫万事之理，而关乎亿兆人民之生。其本在乎身也，其则在乎家也，其功用极于天下之大也。圣人立之以教，人君本之以治，士子业之以为学，而用以辅君。是盖六经之总要，万世之大典，二帝三王以来，传心经世之遗法也。”（《大学衍义补序》）这一评价已经把《大学》一书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几乎是不读此书无以为人，无以为帝，无以为天下的地步。

但《大学》原书仅孔子的二百五十言，加上曾子及其门人的解释，也不过

是些纲领、原则性的东西，要加深理解，必定要加以补充。朱熹把《大学》比为一个“坯模”，一个“题目”，一个“空腔子”，须要以很多材料来“填实”。又说“《大学》是为学纲领，先通《大学》，立定纲领，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。”（《朱子四书语类》）这正如邱浚所说的“《易》也，《书》也，《春秋》与《礼》也，《论》《孟》之与《中庸》也，皆所以填实乎《大学》一书。”（《大学衍义补》卷七十七。下引此书，只标卷数。）这就是说，儒家经典的立论主旨，都由《大学》一书所阐明了。“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这就是一切儒学的归宗汇元之论。由此可知，《大学》一书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。宋以前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，让它混在汉代学者所辑录的《礼记》一书中，所以宋代二程将其剔出，被认为是儒学研究的一大功劳。其后，朱熹在二程研究的基础上，又为《大学》作章句、或问，使其中义理更为明白，流传更为广泛，也算一大功劳。宋代学者真德秀也当仁不让，为“填实”《大学》一书，取经传子史的有关材料写成《大学衍义》一书。此书在明代皇室中，作为治国临民的方略，受到重视。明神宗在《大学衍义补序》中说“真氏《衍义》，我圣祖大书于庠壁。累朝列圣，置之经筵。”已经成了每一位皇帝的必修课目。

然而，真氏的《大学衍义》只“衍”到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这几个题目，尚缺“治国平天下”这一节。而从治理国家的实用意义上看，这一节又是万万少不得的。邱浚说“阙其一功，则少其一事，欠其一节，则不足以成其用之大。而体之为体，亦有所不全矣。”所以，为使统治者能掌握全面，不出殿廷而知邑里边鄙之情，不履城阊而知朝廷官府政务，邱浚下决心补全这一节，写出了这部达一百多万字的《大学衍义补》。

从邱浚的写作动机上看，这一“补”显然着重于治国安邦的具体策略，具体方法上。所以全书的十二个条目，如正百官，固邦本，制国用，明礼乐等，无不透露一种操作握算，执掌全局的“统治”精神。“非独举其要，资出治者以御世抚民之具，亦所以明其义，广正君者以辅世泽民之术。”（《大学衍义补序》）“具”与“术”自然是临御操作时的设施、技巧，已经形象化地道出了这部书的实用目的。因为从实用出发，书的体例在引证前代（特别是二帝三王时期的“三代”）的治例之后，邱浚就以“臣按”的按语形式，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为中心，结合个人的闻见，来一番阐述评点，指出优劣得失，提出解决方案，纵论功过是非，恰如他在序言中所比喻的“一方可以疗一证，随其方以己其疾”。这在“资治”方面，比司马光的《通鉴》还要实用。司马光以历代兴亡之迹为鉴，邱浚以古今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为例，前者重在心理体验，加深认识；后者重在对比鉴别，择善而取。司马光明的是“体”，邱浚传的是“用”。朱熹谓“某于《大学》用功甚多。温公作《通鉴》，言‘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’。某于《大

学》亦然。”(《朱子四书语类》)看来,朱熹是想把他在《大学》的研究整理方面所用的功夫等同于司马光编著《资治通鉴》一书。而二书的纲领,从儒学的观点看,自然都是希望为封建统治者找到理想的统治方略,以达到天下国家的长治久安。邱浚向来推崇朱熹的学术地位,他作《大学衍义补》显然也是想尽“平生精力”把朱熹的意图更具体化、实用化。

《大学衍义补》就是这样的一部书。

“治国平天下”,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皇权,维系皇帝的“万世基业”。但邱浚在他的《大学衍义补》中,却反复强调,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在于爱民。这形成了该书十分鲜明的特点。

邱浚在引述朱熹的观点后,这样论述:“人君所居之位,极崇高而至贵重。天下臣民莫不尊戴。譬则至大之宝也。人君居人大宝之位,当体天地生生之德,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,使之得以生聚,然后有以保守其莫大之位焉。”(卷一)这就非常清楚地摆正了人君的统治地位与百姓生存之间的关系。而且还强调了统治者“当体天地生生之大德,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”的“天职”。按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,先天存在的理与气是万物化生的本源。天与地的功用就是循这理与气的动静而化生人和生物,所以“天地以生物为心”“生生不已者,天地之大德”。帝王本人也是这一变化的产物,但由于他们禀天地之性比平常人为完美,故能与天地“合德”,所以能居大宝之位。天生君主是让他们“继天出治”,很好地行使天职,治理人民。因此人君“恒必兢兢业业,敬以存心,明以烛理,刚以制欲。”(卷三)“非固假是崇高宝贵之位以畀之,使其淫肆于民上,以快其所欲。”(卷四)这显然是对皇权的一种规范,是对皇帝本人私欲的制约,而且是以上天的名义发出的。有了这一条,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皇帝行使一切有利于人民生存的权力。

如在“正朝廷”中指出,“朝廷之政,其弊端之最大者,莫大乎壅蔽”,即消息闭塞,不了解下情。“下情不能以上通,则民间利病无由而知”,不知民间疾苦,自然没有利民之政,祸乱就会因此而生。他又进一步指出“人君修德以善其政,不过为养民而已”,因此“自古圣帝明王,必奉天以养民,一以养民为务。”知人民的疾苦,以养民为己任,这是邱浚在《大学衍义补》中所立下的好皇帝的标准。为着这标准,皇帝要正心术,立纲纪,亲贤臣,远小人;要严赏罚,“非一人喜怒之私,乃众人好恶之公”;要谨慎号令,毋得朝令夕改,失信于民;要广开言路,兼听纳谏,不罪言者。在“正百官”中指出,“凡夫朝廷之间,百官庶务,何者而非为民者乎?”“臣之事即君之事,君之事即民之事”,因此,不仅为君的要秉承天命,爱民养民,为官的更要“恤君之民”不准糟害百姓,刻剥百姓以奉养私欲。为要“正百官”,先要定好百官的职能,不能滥设职

位；要礼敬大臣，互相信任；要防奸佞小人离间；要重视监察百官的“台谏”之职，以打击贪官污吏；用人要循资格，但又不唯资格，重在得人；要按期考察官员的政绩；反对卖官鬻爵，以官职谋利，等等。

有了一个仁慈圣明的皇帝，又有一个廉洁公正的官府，人民的幸福自然有保障。不仅如此，按“治国平天下”的顺序，邱浚还渐次提出固邦本，制国用，明礼乐，秩祭祀，崇教化等题目。在发展农业，减轻负担，抑制兼并，救济灾荒等方面，向皇帝提出了许多利民便民的建议，把民众的利益始终摆在“治国平天下”的首要位置上。这种突出的民本思想，正是孟子所提出的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儒学经典的主张。在专制气味特别浓，专制制度特别严密的明代，如此强调人民的利益是很不容易的。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很不耐烦孟子的学说。当他读到孟子对君权稍有不逊的议论时，曾大发脾气，说：“使此老在今日，宁得免乎！”（《鲒埼亭集》）大有斩杀“今日孟子”的口气。假如不是孝宗皇帝当政，邱浚的议论能不能公诸于世，也未可知。

由此想到纪昀在《提要》中对本书的评价：“明之中叶，正阉竖恣肆之时，浚既欲陈海纳忠，则此条尤属书中要者，乃独无一语及宦寺。”这一评价也未必公允，倒是讥笑不敢赤膊上阵的人为懦夫一样。陆容在《菽园杂记》中提到：“《大学衍义》一书，人君修齐治平之术，至切至要，非迂远而难行者。其中三十九、四十卷，‘齐家之要’，乃引前代宦官之事，忠谨之福仅八条，而预政之祸四倍其多。纵使人主知读之，左右其肯使之一见哉？苏人陈祚宣德间为御史，尝上章劝读此书。上怒，逮祚及其子侄八九人，俱下狱，禁锢数年。上宾天，始得释。成化初，闻叶文庄亦尝言之。不报。”邱浚是同时代人，应该清楚这些事件。如果说他有什么“难言之隐”，恐怕就是要吸取这些教训，避免因宦官的事导致此书不能刊行。因为治平之事，不仅仅限于阉党专权一事。而且，指斥本书“独无一语及宦寺”也不合事实。如卷首“防奸萌之渐长”，引唐李德裕被宦官王守澄所谗间罢相事；卷十二“戒滥用之失”引唐中宗时，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官达千人，任用术士叶静能为国子祭酒事；同卷引代宗大历元年，以宦官鱼朝恩判国子监事等，都意在揭示阉党干政的祸害。而卷一百十八更直接议论：“汉初宿直皆以士人为之。其后不用士人，而所用皆宦官，遂至内外大权悉归之，以为一代之祸。”若论邱浚对宦官的态度，看他的儿子邱敦所作《发冢论》，可谓历数宦官专横之罪，淋漓尽致。邱浚能不知道？况且，按本书体例，主要是引述前代的治例加以论述，没有必要指名道姓指斥本朝人物。如果那样立论，反而显得乖张失态，不合体例。纪昀“无乃”之责如果指的是这种情况，更属无稽。

本书的另一大特点是对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兴废，十分谙熟。纪昀的

《提要》对此亦予肯定：“且浚学本淹通，又习知旧典，故所条列，原原本本，贯串古今，亦复具有根柢。其人虽不足重，其书要不为无用也。”在纪昀的眼里，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就在这“习知旧典”上。姑且勿论这评价是否准确，这“习知旧典”在每位接触本书的读者心里肯定会留有印象。几乎每件历史掌故在书中都可以找到其“事始”。某事始于某时，是研究历史的人常要关心的，但若无丰富的学识，巩固的记忆，谁敢贸然识断？难怪以渊博著称的纪昀也对此表示钦佩。邱浚此书不是为了研究历史。他之所以经常指出某事之始，正如刘知几《史通》所言：“此皆正其疆里，开其首端，因有沿革，遂相交互。事势当然，非为滥轶也。”指出事始，作为“资治”之具，可以把握事情发生发展的态势，便于从中吸取教训。而且从事始追索，按时间先后，可以系统地交待出某事的今古演进情况，丰富其借鉴意义。从这一点上看，邱浚的著述，甚至比某些历史著作还更完善，更有史学意义。

比如，历代帝王褒封、祭祀孔子及其门人、后裔之事，向为史家所重的郑樵《通志略》仅从汉元帝赐爵孔霸，从平帝元始初，追谥孔子“褒成宣尼公”开始，至唐开元二十七年，追赠谥孔子为“文宣王”止。但邱浚的考述却从鲁哀公祭文中称孔子为“尼父”开始，认为“此后世追谥孔子之始”“自哀公谏之后，后世帝王屡加褒崇。”（卷八十）又以汉高祖刘邦过鲁，以太牢祀孔子为“汉以来祀孔子之始”。时间都比《通志略》所记为早。而下限又一直延伸到宋真宗咸平三年追祀孔子为“至圣文宣王”，元武宗大德十一年追封孔子为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。中间历代褒崇、追谥，大都有交代，有事始，的确是“贯串古今”。而且从“资治”的角度，邱浚还就此发表议论：“孔子所以为万世帝王之师，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称。曰王曰帝，有与否，皆不足以为吾圣人之轻重也。”“与其崇圣人以虚名，孰若遵圣人以实理？唐玄宗谥圣人以‘文宣’似矣，然而唐衰湮伦，圣道安在？宋真宗加圣谥以‘至圣’似矣，然伪作天书，圣道如何？臣故曰，与其崇圣人以虚名，孰若遵圣人以实理。”（卷八十）这真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封建帝王“尊崇”孔子的虚伪性。统治者本人假如不能制欲正身，以仁爱之道律己爱民，又怎能希望通过这些褒崇追谥的表面文章去劝导百姓，敦化风俗呢？尊崇要出于真诚，正人先须正己，这是邱浚引述这段史事的议论主题。应该说，这是非常卓越的见解，放在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当中也毫不逊色。

本书还有一个特点是百科全书式的内容与结构。全书除卷首系统真德秀“诚意正心之要”，补“审几微”一节外，共一百六十卷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法律等各个领域，而每一个条目，又尽量包揽该科目的各个方面内容，分成几个小题目叙述。小题目多的有十六个，少的也有六七个。在广博深